



圓瑛大師的佛學思想

蔡惠明

一、愛國愛教，為法為人的一

今年是一代高僧圓瑛大師圓寂四十周年紀念。上海佛教協會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、上海宗教研究所、上海宗教學會等聯合發起舉行「圓瑛大師佛學思想」研討會，邀請全國有關學者、專家二十餘人在滬進行學術會議三天，並編印出版「圓瑛大師佛學思想研討會論文集」。筆者是籌備組成員之一，曾有幸親近大師及他的法子明暘法師，參加「圓瑛大師年譜」的編校工作。謹就個人學習圓公著作的體會撰寫本文，意在拋磚引玉，敬請國內外善信大德，有以教正。

圓瑛大師（一八七八——一九五三）俗姓吳，名宏悟，字今悟，又號一吼堂主人、三求堂主人、靈源行者、離垢子。福建古田縣平湖端上村人。他是五房中的獨苗，大家庭中最受寵愛。五歲時父母雙亡，稍長業儒，過目成誦，聰敏逾人。十七歲頓悟人生如夢，意欲出家，被叔父所阻。十八歲大病初愈，遂決心禮福州鼓山湧泉寺增西和尚為師，披剃出家。十九歲依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，並發心參訪諸大名刹，先於常州天寧寺親近冶開和

覺，守至今世世界由轉運，以及日勤持修音聲禪法，其靈味與實共升學。因此，貴國與轉運由靈材歸，其靈主，靈與味能其最大由轉運而升，其靈與味能轉運與實，與國以「六味」轉轉來。其靈與味能，其音聲禪法由靈材歸，其靈與味能轉運與實，與國以「六味」轉轉來。其靈與味能，其音聲禪法由靈材歸，其靈與味能轉運與實，與國以「六味」轉轉來。其靈與味能，其音聲禪法由靈材歸，其靈與味能轉運與實，與國以「六味」轉轉來。

圓瑛大師畢生致力於佛教組織工作，促進佛教各宗各派以及各民族間的團結。一九〇七年，寄禪和尚主持寧波教育會時，他就盡力協助，參加學劃。辛亥革命後，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召開中

華佛教總會第一次代表大會，他曾出席並積極參加工作。一九一四年中華佛教總會在北京正式成立，他當選為參議長。一九一七年出任寧波佛教會會長。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佛教代表大會，決議成立中國佛教會，他當選為主席，以後連續七次被選為主席或理事長。建國以後，他又與虛雲、喜饒嘉措、趙樸初等共同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，被選為第一任會長。他一生為佛教界團結作出努力，任勞任怨地為護教和教務奔走，深受全國佛教徒的崇敬和愛戴，同時也獲得國際佛教人士的讚揚。如日本著名佛教學者、中日友好協會會長道端良秀教授在他所著的「中國佛教史」中寫道：

「圓瑛法師在民國初期着手籌備中國佛教會，經公開選舉由他當會長，各省會分設分支機構，直接開始進行各項活動，請求政府改正以寺廟辦學的寺廟管理條例，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改為監督寺廟條例，清除了對寺廟的迫害。」當時寄禪和尚就是為寺廟辦學到北京請願，受到冷遇，悲憤而逝的。

圓瑛大師還是愛護祖國、保衛和平的典範。抗日戰爭初期，他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會理事緊急會議，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運動，並親自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長，組織蘇滬佛教青年，成立僧伽救護隊，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，以大勇無畏精神，從事戰地救護工作；又協助各地成立救護隊，辦起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，收容無辜難民和為國受傷的戰士。由於當時各收容所和佛教醫院經費發生困難，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和一九三九年夏，二次赴南洋籌集經費，在新加坡，由華僑總商會發起組織「新加坡華僑籌款救國委員會」；又於吉隆坡、檳榔嶼、怡保、馬六甲等地推行「一元錢救國運動」，激發廣大僑胞愛國熱情，

得到廣泛響應。就在一九三七年秋，第二次去南洋募款回國後不久，九月一日那天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成立，圓公領眾於大殿上供禮佛時，突然闖進日本憲兵隊數十人，態度蠻橫，如臨大敵，以「抗日份子」罪名逮捕他和明暘法師，押往日本憲兵司令部進行嚴刑拷問，並用手槍威脅，企徒迫使師徒倆承認「抗日救國有罪」。但師徒倆堅貞不屈，審訊毫無結果。第二天就被押解到南京日本憲兵總司令部，關押二十多天，他們進行絕食抗議，迫使憲兵總司令部宣告無罪釋放。出獄後圓公因身體虛弱，住進醫院療養一個月後回圓明講堂。當時日本在上海的東本願寺僧人藤井草宣幾次來訪，請他出任「中日佛教會」會長，均被以老病推却。此後就閉門謝客，潛心著述。在此期間，他給北平佛學院師生贈言却寫了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佛教興衰，教徒有責。」十六個字，鮮明地號召佛教青年「救國興教」，具見他愛國愛教的滿腔熱忱。

一九五二年在北京召開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」。圓公寫信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郭沫若表示擁護，信中說：

「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為人類之福祉，是當前保衛和平的偉大事業。佛教的慈悲教義是愛好和平的，尤其是佛教的大乘無我利他的精神是爭取和平、拯救和平，以眾生的利益為利益的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此次和平會議的召開，其精神與重要性，不但符合世界和平的願望，並且符合我國佛教教義，我們佛教徒竭誠擁護。」在出席亞太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，圓公與喜饒嘉措上師共同被選為佛教代表，並在會議期間與各國佛教發表了聯合聲明，聲明說：

「制止侵畧，保衛和平，是當前一個迫切任務，也是我們佛

教徒的迫切任务。因此我們號召各國佛教徒團結起來，爲實現亞太和平會議的決議而作出一切努力。」在北京佛教徒的歡迎會，圓公又發表講話說：

「我們佛教徒既爲佛子，當作佛事。什麼是佛事？偉大的和平運動，真是佛事！」他在參加亞太和平會議後回到上海，馬不停蹄地就在圓明講堂啓建「祝願世界和平法會」，對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宣傳，不遺餘力。

圓公一心熱心慈善事業，爲社會做好事。他初任寧波佛教會會長時，就創辦僧、民二校，僧校教育佛教青年，民校培育貧寒子弟。一九一八年，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，實行半工半讀，博得社會好評。一九二三年他在南洋講經時會同新加坡轉道、巴生轉物二和尚共同發起重興泉州大開元寺，並創設開元慈兒院，收容沒有父母的孤兒。學科設置依照普通學校，對學生供給膳宿、衣服、醫藥，教養兼施。從開辦到結束，共培養了數千人才。一九二六年他爲籌集慈兒院經費，遠跋南洋群島講經，把香金供養等全部收入撥充慈兒院基金，既爲法又爲人，財法兼施。

圓公會任國內外十大名刹的住持，即泉州大開元寺、寧波天童寺、福州崇聖寺、寧波七塔寺、福州林陽寺、古田極樂寺、福州鼓山湧泉寺、福州雪峯寺、上海圓明講堂以及檳榔嶼極樂寺等。他在天童寺升座後，制定了「十二不」的共守規約，就是不貪名、不圖利、不營私、不舞弊、不苟安、不放逸、不畏強、不欺弱、不居功、不卸責、不徇情、不背理，重振古德住山道風，使叢林耳目爲之一新。日本著名學者常盤大定曾於一九二九年到福州雪峯寺訪問，並在所著「中國佛教史迹踏查記」中寫道：

「圓瑛和尚率徒七、八人爲一團，隨衆和尚概爲青少年，我看他年一定會從中湧現出優秀人物的。和尚很有骨氣，一見有豪傑之風並富有統理大眾的才幹。」這一評語非常中肯，圓公在晚年創辦「楞嚴專宗學院」，培育了大批高級僧才。其中著名的有：已故「中國佛教會」會長白聖法師、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明暘法師、山東省佛教協會會長明哲法師、汕頭佛教協會會長定持法師、香港圓明講堂住持定因法師、上海玉佛寺都監明如法師等，他們都是當代佛教的中流砥柱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

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三時圓瑛大師在寧波天童寺安詳捨報，世壽七十六歲。他在逝前立有遺囑，寫道：

「余一期將盡，力疾還山，身托祖庭，心棲淨土。茲當長別，願留數言：

一、社會道德普遍提高，時節因緣不可思議。凡我佛子，各宜精進，力行十善，勤修六度，行菩薩道，報衆生恩。各宗各派，同宣斯義，出家在家，各盡其力，互助無諍，團結第一。

二、余以衰年，幸逢盛世，願我佛教徒同心同德，參加愛國運動，致力和平事業，應思利民護國，饒益有情，乃成佛之基，衆善之首。

三、四大幻住，遷化隨緣，身後安排，宜從簡畧，發計開弔，世俗所爲悉當免除，毋增罪咎。

公元一九五三年八月 圓瑛（簽字）

二、圓瑛大師的佛學思想

圓瑛大師三十一歲開座，先講「護法論」於福州鼓山湧泉

寺，後感普賢菩薩摩頂加持，精研「首楞嚴經」，被譽為「楞嚴獨步」。他在「楞嚴經講義自序」中寫道：

「於經中疑義，深奧難解之處，遂一一書條貼於壁上，逐條靜坐參究，既明白一條，即扯一條，如是八年之久，一房疑義，扯盡無餘。」可見他對「楞嚴經」的研究是下過一番苦功的。他的佛學思想也是以「楞嚴」教義為基礎的。此經共十卷，第一卷為序分，講述這部經的說法因緣：佛遣文殊師利以神咒保護阿難，免受摩登伽女誘惑破戒，並為阿難說禪定能斷煩惱，以顯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等。第二卷至第九卷為正宗分，主要闡述「一切世間所有物，皆及菩提妙明元心；心精遍圓，含裹十方。」眾生不明自心「性淨妙體」，所以流轉生死，當修禪定，以種種顛倒之見，通過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等覺、妙覺等由低至高等修行階次，達到方盡妙覺，成無上道。第十卷為流通分，講述此經永留後世，利益眾生等。明清以來，以「楞嚴經」為依據，融會各家的紛歧，是佛學研究的主流，而圓公是近代這一主流的代表人物，他對「楞嚴」鑽研最深，見解獨到，尤有新的發展。據「圓瑛大師年譜」記載，從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半個世紀中，圓公研究「楞嚴經」從未中輟，有三次因用功過度而咯血。仍不斷開發新義，共宣講此經十三次。一九四五年開辦「楞嚴專宗學院」，他又為全體師生宣講此經，當時他已六十八歲高齡，仍日夜備課，編寫講義一直至深夜。「皓首窮經」的勇猛精進精神，使全體師生感動得潸然淚下。我國佛教自隋唐以後，數禪宗與淨土宗最為流行，一直綿延不衰，而「楞嚴經」既有兩宗的涵義。如禪宗的「明心見性」，淨土宗的「唯心淨土」都可在「楞嚴經」中找到根據。圓公從二十四歲聽此經有所領

悟，發心鑽研八年，深有心得。以後多次深入淺出地講述此經，並以簡馭繁地編寫「首楞嚴經講義」二十四卷，五厚冊，堪稱傳世力作，為近代「楞嚴經講義」的範本，這是他對近代佛學研究的重要貢獻。

圓公還致力融會教禪，兼弘賢首。天台、賢首二家，歷代皆據本宗經典，揚自抑他，門戶之見較重。被尊為華嚴五祖的宗密（七八〇——八四一）初承荷澤宗禪法，精研「圓覺經」，後又從澄觀學「華嚴經」，所以融會教禪，提倡禪教一致。他曾倡說：「一部大藏經只有三種教，禪門言教也只有三種；而這三教三宗是相應符合的，是一味法。」他認為「華嚴經與禪宗可合為一，同歸之為一乘顯性教。」這個判教說與華嚴宗始祖法藏的判教說有顯著的不同（見「原人論」）。圓公會習天台，對天台教觀十分敬佩。後來看到學天台的人漸多，習賢首却日少，他覺學佛法不應拘泥於門庭之見，於是改宗賢首。但他一生在講經和注釋佛經時，却是兩宗並重，排除門之見，以達融通圓到的目的，這是他的獨到之處。他在「首楞嚴經講義」一書中寫道：

「賢首與天台四教，兩宗判教，雖有四、五不同，應知名異義一，不過開合而已。天台開賢首之始，為通、別二教，合賢首終、頓圓教為一圓教。……宗即各立，義無差別，不可分河飲水，各存門戶之見，若自是他非，不但不明他宗，抑也不徹自宗。」昔來釋尊觀機施教，所說的法並無高下，在理上通融無礙，由於學者各有所重，揚自抑他，引起爭執。如果認識法平等，互相尊重，取長補短，共同提高。門戶之見也就不會執持了。

明智旭（一五九九——一六五五）在佛教理論上提倡性相融合，於實踐上主張禪、教、律三學統一，宣稱禪是佛心，教是佛語，律是佛行，同歸一念。在他著作中可散見禪、教、律歸入淨土的思想。後來台家講教大多依據他所釋的經論，因而形成合教、觀、律歸入淨土的靈峯派。圓公在這一基礎上又加發揮，因此他的佛學思想不僅以「楞嚴」為基礎，而且圓攝禪、教、律，歸於淨土的。他的弟子受學面極廣，各有成就。可見他不愧為一代宗師、釋門通家。

禪宗在中唐以後是我國佛教的主流，但進入兩宋，逐漸衰落，僅臨濟、曹洞二家維持門庭。圓公先參常州天寧寺冶開和尚，修禪五年，與應慈法師是同參（應老號「華嚴座主」，是近代賢首宗大德，接冶開和尚的法，為臨濟法派第四十二世）。後又往寧波天童寺從寄禪和尚習禪六載。宋曹洞宗正覺（一〇九一——一一五七）禪師住天童寺創默照禪，主張在寂默處觀照體用、理事、動靜、空有、明暗等，作為明心見性的方法。日僧道元（一二〇〇——一二五三）於南宋嘉定十六年（一二二三）來中國，留學五年，從天童寺如淨長老（曹洞宗第十三世）受禪法，回國後在日本越前（今福井縣）建永平寺，成為日本曹洞宗總本山，天童寺遂被奉為其祖庭，立有道元禪師紀念碑。圓公參禪十餘年，二次出現定境，並於一九〇六年，得法於寧波七塔報恩寺慈運長老，傳臨濟正宗第四十世。他的禪學根底是深厚的，兼有臨濟、曹洞二宗之長。他著的「住持禪宗語錄」就是他的禪宗法語，而「一吼堂詩集」則是他的禪詩集子，禪意濃厚，妙語如珠。他的佛學思想是以禪為本的。但在一九一三年因讀延壽、蓮池兩師著作後，有所轉變，才提倡「禪淨雙修」凡四十年。「禪淨雙修」始倡於北宋延壽大師。他認為唐末以來，禪宗頗多流

弊，當時的「禪師」胸無點墨，邪正不分，因而發憤著「宗鏡錄」，意在扶衰救弊。他的「禪淨四料簡」高度評價「禪淨雙修」尤如「戴角虎」，無往不利。清末民初，禪宗流弊有抬頭之勢，圓公遠紹祖風，選擇「禪淨雙修」的道路，對指導當時佛教發展方向，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這是他一生修學的轉折點，此後他便從禪入淨。他自撰「念佛回向偈」說：「願消累劫諸業障，願得福慧俱增長，願盡此身出娑婆，願佛接引生安養。」在改堂名為「三求堂」後，自題楹聯：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淨土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侶僧伽。」還賦詩云：「恰恰念佛時，恰恰無佛念，無佛恰恰念，常念恰恰無。」反映了他念佛入定的境界，這即是事而理，不假分別，不落思量的無上深密的禪。他認為禪淨兩宗相同處在於：禪是單刀直入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屬圓頓修淨法門，屬最上一乘。而淨土宗對於上利根性，是有無雙遣，一性圓明，與禪宗的圓明覺性沒有差別。在他看來，「禪淨兩宗皆是如來示教，不可有所是非；禪淨雖有二名，其理則一，不過入門不同，各隨機宜而已。」在他圓寂前一年（一九五二年），時年七十五歲曾口占一絕：「禪淨雙修四十年，了知淨土是深禪。有人問我其中意，雲在青山月在天。」說明他一生修持經歷的途徑是從禪到淨，禪淨雙修，淨禪一體。他曾為天童寺二位坐脫立亡的僧人寫往生傳，宣傳淨土法門的真實不虛。他自己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在僧眾念佛聲中安詳往生。

在紀念圓瑛大師圓寂四十周年的日子裏，我們要繼承和發揮他老人家的佛學思想和未竟事業，致力於佛教各宗各派和各民族之間的團結，積極參加愛國愛教、為人為法的活動，利民護國，饒益有情，為經濟建設、祖國統一、保衛和平共作貢獻。衷心祝願圓公為廣度眾生，早日乘願再來！